

第六章 結論

一、中共對美日安保同盟體制在認知上的變化

從 1955 年「中共中央關於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畫」所揭示之美軍從日本撤退、反對美國在日本建立軍事基地、反對重新武裝日本和復活軍國主義等等主張，可知中共最初對美日安保體制採取的是反對態度。1960 年代受到國內政治運動的影響下，與美蘇兩強展開對抗，因而對美日安保的批判逐漸升溫。1969 年中共高層內部對國際情勢的判斷出現轉變，透過與美和解及與日建交達成聯手對付蘇聯的包圍態勢，對美日安保體制的評價出現關鍵性的變化，轉而積極評價並予以認可。

如前所述，在 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中共與美、日兩國由於在對蘇聯戰略上的趨近與合作，因此中共開始將美日安保體制視為對蘇戰略上的資產，冷戰時期中共「美日安保」觀的第一項認知也因此形成。在冷戰的特殊背景下，出於共同對付蘇聯此一考量的第一項認知則成為接下來其他認知的基礎，相對而言甚為重要。美國不但以共同對付蘇聯作為說服中共認可美日安保體制的理由，接著又以美軍在亞太的部署亦符合中共利益，以壓制日本軍事大國化的「瓶蓋效用」論向中共遊說。在美中和解的背景下，「瓶蓋效用」論遂成為了中共認可美日同盟體制的第二項認知。經歷了美中和解、中日關係正常化，中共基本上與美日就「一個中國」政策達成了初步的共識，加上在對蘇戰略上的合作使得中共對美日安保體制的疑慮得以消除。再者，中共當時面臨了大躍進以及文革等政治運動後恢復國內經濟生產的重大難題，因此與美日合作藉此引進資金技術遂成為當下首要的工作。政策優先順位考量的第三項認知自此確立。

「一九七二年架構」的逐漸形成，使得台海情勢得到一個基本的穩定，雖然中美兩國於 1979 年正式建交，「一中」問題獲得解決。但美國在 1982 年「台灣關係法」中對台灣安全維護的承諾，遂成為其後中美關係摩擦的重要因素。而中

共於 1970 年代末期一度出現的對日防衛力積極評價，亦因中日間「歷史問題」的發酵等等因素使得兩國關係出現倒退。中共與美日安保體制自 1970 年代後半至 1980 年代前半的一段蜜月期(出於共同對付蘇聯)，至此遂告一段落。然而 1982 年「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產出，除了反映當時中蘇關係逐漸回溫並邁向和解及正常化之路外，也標示著中共欲開始與美保持距離的心態，以靈活的不結盟姿態獲得外交上更多的空間；再者，日本在政經上的蓬勃發展，與其在安全防衛戰略及政策上的動向，使得中共開始注意到日本崛起的可能，再次引發中共對日軍國主義復活的疑慮，「瓶蓋效用」出現弱化的趨勢；又加上「台灣問題」被突顯出來。因此中共對美日安保體制的態度又出現了變化，「潛在對立」的效應逐漸升高。

進入冷戰後時期，由於兩極體系的崩潰及蘇聯的瓦解，中美日三方共同對付蘇聯的戰略合作告終，第一項認知正式結束，這也自然引發中共對美日安保在態度上的微妙變化。首先是 1990 年代前半期美日歷經了同盟關係的倒退期，美日同盟是否應該在冷戰結束後繼續存在？或是要以何種方式存在？受到了各方的質疑。但隨著日本經濟威脅論的趨弱以及隨之而起的中國威脅論的增強，以及 1995 年「奈伊報告」的產出，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進一步得到確認，美日同盟關係在軍事安全上也從冷戰時期的對蘇聯圍堵，逐漸演變為確保美日兩國利益及亞太地區穩定的公共財此一方向前進。中國的崛起使得美日同盟與中共在戰略上產生摩擦，將中共視為潛在敵人以及戰略上圍堵中共的意圖因而形成。

而美日同盟再定義的過程中，對於防衛範圍是否涵蓋台灣的「週邊事態」見解，遂成為中共關注的焦點。在中共的認知當中，1960 年的「遠東條款」及 1969 年「佐藤・尼克森聯合聲明」中的第四項「台灣條款」中，關於美日安保條約防禦範圍擴及台灣的聲明，在 1970 年代初中共分別與美日和解建交後已完全失效。然而再定義使得「遠東有事」又以「週邊事態」的形式再次出現於美日安保共同防禦範圍的定義中。中共對美日安保同盟體制再次染指台灣、對其統一大業可能有的嚴重阻礙，當然無法置若罔聞、置身事外。加上「一九七二年體制」此

一過渡性架構出現鬆動，1980年代後期兩岸開放交流以及1990年代中國經濟的崛起造成兩岸實力不對稱擴大，台灣方面在憂慮經濟上被吸納的情況下，出現了在政治上與中國區隔的聲音，加上台灣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所形塑出的自主性，皆對此架構造成嚴峻挑戰，維持「一九七二年架構」的支柱之一，也就是台北對「一個中國」的認同於此時期出現鬆動。又台海危機中美國派遣航母巡弋，以行動宣示了反對中共訴諸武力解決台海問題的決心，使中共對美日安保體制中週邊有事對台灣所引發的效應保持高度的警戒。而美日安保再定義後TMD的動向，中共官方發言側重於關注TMD的發展意圖及用途，將其定位為政治問題，並強力防堵TMD技術及設備擴散至台灣。美日雙方透過再定義，促成了日本與美國在因應「週邊事態」上，較以往更為確實的共同軍事行動。在中共的眼中看來，日本在軍事行動上更進一步突破過去「專守防衛」的政策，認為美日同盟朝參與進一步干涉週邊及國際事務的「外向型」發展。

冷戰結束後美日同盟與中共既然少了蘇聯此一共同敵人，第一項認知自然土崩瓦解，第二項認知在此一階段由於「瓶蓋效用」論逐漸受到質疑而趨弱，第三項認知因為「週邊事態」的解釋以及TMD發展動向涉及台灣問題，以及美日與中共在軍事戰略上的衝突而有強化的趨勢。

九一一事件雖然使美國將全球戰略的首要目標轉移至反恐議題上，中共與美國在戰略上的對峙暫時得到緩解。但從後續的發展看來，中共主導「上海合作組織」背後所精心部署的戰略，因美國勢力介入中亞而遭到破壞。而中共對美國的全球反恐行動也只能消極地不反對，江澤民即表態對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存在表示肯定，因此表示不再反對美日安保。而日本藉由支持美國反恐，積極進行在軍事戰略上的調整，突破舊有束縛，朝正常化國家以及全球政經大國之路邁進。中共對此的態度除了表達關切，也只能持續關切。

二、中共的因應對策

爲因應冷戰後國際情勢的變化，中共作爲一個大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唯有更加融入國際社會，積極提出一套著眼於未來「多極化」國際格局形成的「新安全觀」，對美國可能對己造成的負面影響做有限度的對應，避免與目前體系中的唯一超強美國正面衝突，以營造一個發展經濟、利於崛起的和平環境，才是中共當前的首要目標，簡而言之可以「韜光養晦、有所作爲」八字概括之。

環顧冷戰後東北亞地區的情勢，中美日此一三角關係重要性逐漸增大，中共理當借鑑 1980 年代初在美蘇中大三角中所扮演過的角色，當時「獨立自主外交路線」及不結盟策略的提出，使中共在三角關係中取得了主動靈活性。北京方面若能夠加強對美關係、穩住中日關係，那麼將能身處「樞紐」地位，坐收美日成爲中共的「側翼」之效。如此也不難得知爲何冷戰後美日同盟關係得到進一步的鞏固下，即使中共在與美日兩國的雙邊關係中曾出現程度不一的難題與危機，北京方面總是如此審慎應對了。中共既然深諳在當前國際格局下，應避免與「一超」美國形成對立的「韜光養晦」之道，沉著應對之餘，面對美日安保體制對己所造成的不利局面，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必會「有所作爲」加以反制。

首先，觀察「新安全觀」的產出及其實質內涵，在本文的研究中發現，中共積極參與多邊安全合作組織，並透過公開場合不斷推銷「新安全觀」，背後隱含著對付美國單邊主義的目的。中共藉由在國際公開場合對「新安全觀」內涵的逐步提出及詮釋，以消除週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負面疑慮，謀求最大程度抵制對其國家利益受損的不利因素，例如公開反對美國主導下以軍事同盟爲基礎的舊冷戰式的和平，宣揚行之有年的「和平共處五原則」，避免國際對其內政問題，特別是對台灣問題的干涉。「新安全觀」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而言，確有積極出擊的正面效應。

然而中共的「新安全觀」儘管強調新，仍不脫舊有的冷戰思維及心態，透過一連串對「新安全觀」概念的分析(聽其言)後，再檢視中共的行動(觀其行)後，

可以發現「新安全觀」可說是重新包裝再上架，其概念僅僅是循著國際政治中對現有「安全概念」發展的探討下，結合自身利益的一種論述主張，換句話說，就是一種參雜著濃厚現實主義外交考量下，一種自由主義形式的道義宣揚手法。這點可以從本文對中共在諸如東協區域論壇以及上海合作組織的行為分析中可窺之一二。

九一一後中共既然已無法突破美國勢力在中亞地區的介入，「上海合作組織」的反恐意義已被美國所吸收，以「上海合作組織」作為反制以美國為主的雙邊軍事同盟之實際效果大打折扣。延伸上述的概念，中共若能突破軍事安全的思維，加強該組織在經濟合作方面的實質發展，將「上海合作組織」轉型以經貿為主、軍事安全為輔，那麼該組織的功能將不那麼容易被美國喧賓奪主而取代。¹

再者，中共方面當然警覺到若不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將此美中日此一重要的三角關係穩定下來，那麼中共在 21 世紀亞太地區的國際環境中將受到嚴重的戰略牽制。透過本文對中共官方對美日安保體制的對應中可知，相較於其國內報章媒體的報導及民間的輿論，北京方面的態度是極為審慎的，雖帶有警戒感但又較為克制。因此對中共而言，一個可行的因應對策是堅持以經濟關係作為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的主體，使美日兩國的對中政策中的經濟利益佔據愈來愈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利用跨國企業在美、日國內政治中的影響力，藉此抵銷其國內右翼保守勢力的上升。

依照目前的發展態勢看來，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同美、日之間的經濟依存度將可能達到甚至是超越美日之間的依存度。因此若中共繼續堅持發展與美、日間的經濟依存關係，直到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之日，就能在戰略上及政治上取得主動權。而台灣問題在此框架下，也將可以獲得解決。因此在發展的過程中，中共應會避免與美、日間在個別爭議問題上的衝突升高，以免陷入不利的局面。

如何在中美日三角中取得積極能動性，在中日關係上來說，已有了關於對日

¹ 施子中，「911 事件對中共推動『上海合作組織』之影響」，*戰略與國際研究季刊* 第 4 卷第 1 期 (2002 年 1 月)，頁 174-175。

「新思維」的辯論，「新思維」儘管是學界辯論而非官方明定之政策，但絕對具有其戰略高度及意義，因此可藉由持續觀察後續發展，以理解「新思維」在對日政策上的實踐程度為何。至於中美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在中共眼中可謂「重中之重」，今後要如何處理及面對台灣問題？從本文中的分析看來，在美日安保對「週邊事態」是否涵蓋台灣的解釋、TMD 設備及技術擴及台灣的問題上，美國及日本自然無法不去顧慮中共的強烈反應，而其中也當然就存在著許多類似於議價等等的政治操作，也因此中共將上述問題的調性定位為「政治問題」，而非單純的技術層面問題。當然，基於中共對現今台灣內部政局及兩岸情勢的判斷，既然「一九七二年體制」的基礎受到一定程度的侵蝕，因此在對台政策上保持高度警戒及強硬態度，持續抵制台灣與美日在政治及軍事上的實質合作，並積極發展對台在軍事上的壓倒性優勢等等，是可預見的方向。

綜上所述，中共與「一超」美國之間的關係在「冷靜觀察、沉著應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前提下，即使在兩國關係動態的過程中難免出現摩擦，但基於目前實力仍遠遠落後，加上國內經濟發展需要的是一個和平穩並的外部環境，而經濟持續發展又是維繫其政權穩定的重要前提等等考量，因此「合作不搞對抗」應是在中共在尋求崛起過程中的最佳良策，對美日安保同盟體制的基本態度，在今後一段時間中，也將依循著此一前提審慎地予以應對。